

训,保证其拥有过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,可以熟练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对大数据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,成为教学材料的一项有力依据。

### 5. 总结

综上,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形式,而打造精品思政课堂,培养有思想的、品学兼优的新时代人才更是全民思想正水平的一项重要手段。为了向社会输出一批满足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需求的接班人,要积极将“供给侧改革”的思想应用到高校的思政教育中,增强教育的灵活性和感染力,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,从而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目的。

### 参考文献

[1]周奕.全新视角下思政教育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——评《当代大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》[J].领导科学,2020,(2):125.

[2]曹把芬,唐亚阳.5G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智慧课堂建设的理念与原则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0,(3):76-78.

[3]赵亮,卢佳,邵海亚.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[J].学海,2019,(6):202-206.

[4]唐玉生.大数据在高校招生宣传中的运用[J].学海,2019,(6):210-213.

[5]季海菊.建构网络心理健康的教育体系[J].学海,2019,(6):213-216.

[6]史国君.新时代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培育与塑造[J].学海,2019,(6):199-202.

## 从剪纸贴花瓷器看宋代剪纸的发展

陈明杰 张博

(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漯河 462000)

**摘要** 宋代剪纸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工艺美术产品上,它们作为可信的旁证,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剪纸的重要资料。宋代吉州窑贴花剪纸瓷器,无疑成为这类旁证中数量最为可观,与剪纸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品类。对其产品进行分析,能够窥见宋代剪纸的一些基本情况。本文试着对宋代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图案进行分析,从中考察宋代剪纸的发展历史。

**关键词** 吉州窑; 剪纸贴花; 宋代剪纸

剪纸向来被当作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类或者民俗事项进行研究。关于中国古代剪纸的研究,尤其是明代以前,囿于实物资料的限制,大多只能从零星散布的文献记载中,窥见其发展的痕迹。

从中国造纸技术史、民俗发展史、社会经济史等角度推断,宋代剪纸较唐代剪纸而言更加盛行。“剪纸的制品,民间已广泛应用,举凡与当时民俗有关,无论在居室,在岁时节令,或人生礼仪,巫术一直生活用品等,都有剪纸来派到各种用处。”<sup>1</sup>宋代的很多文献,如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,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,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,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和《周雅堂杂抄》等,都记载了不少当时剪纸的使用、流通、花样等情况。只可惜,剪纸的即时消费与时常更换的民俗特性,脆弱难保的材料特性等原因之下,宋代剪纸的实物遗存至今未有发现,从“二重证据法”的角度看,上述文献未能直观地展现宋代剪纸的发展情况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宋代剪纸在很大范围上,并不是作为最终结果来呈现,而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,或曰中间过程,用在其他工艺美术产品上。剪纸与纺织品印染、刺绣,与建筑雕刻、彩绘等之间的关系,多有被人提及。“古代木匠雕花,曾将剪纸贴在木板上,喷墨定样,建筑彩画、雕漆也用剪纸的型具确定轮廓和造型,然后勾线填色;宋代在生长的水果上贴剪纸,成熟揭下成为喜字。”<sup>2</sup>简便制作的剪纸,做成一种造型的基础方式,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多种工艺上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工艺的发展,并促使其形成特殊的装饰风格。这些工艺美术产品的存世资料较多,作为可信的旁证,或可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剪纸的重要资料。

宋代吉州窑贴花剪纸瓷器,无疑成为这类旁证中数量最为可观,与剪纸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品类。所谓的贴花剪纸,是瓷器装饰的一种特殊手段,剪纸被当作漏版使用,在瓷器的胎色与釉色之间,或者两种不同釉色之间,形成图地关系,显示出装饰图案。考古发现已经证实,唐代的河北定窑、安徽寿州窑等窑口已经开始生产剪纸贴花瓷器,但是宋代的吉州窑无疑代表了这种手段愈加广泛和成熟的运用。对其产品进行分析,能够窥见宋代剪纸的一些基本情况。

宋代吉州窑位于江西吉安永和县,创烧于五代,是宋代著名生产日用瓷的民窑,尤其以黑瓷独树一帜。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以淡黄色地(也有称褐色地)上显黑花为主要装饰特点。这种品貌的形成源于两次施釉,其工艺描述为:先在器壁上施一层富铁底釉,待干后,把剪纸花样贴在器壁上,再施一层低铁竹灰釉,揭掉剪纸,形成图案。<sup>3</sup>虽然在烧制的过程中,有的图案边缘釉料流动渗入,但仍能看出原来剪纸花样的品貌。

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的图案主要有植物、动物、文字、器物、人物等几类,留下了当时剪纸的一些风貌。植物图案可见朵梅、折枝梅、石榴、牡丹、兰、竹、菊花等,其中以梅花最为常见。朵梅图案通常装饰在黑釉茶盏的内壁,以多个六瓣梅花的随意摆放为特色,显示出一种自然随性的美。每瓣花内,对应镂空一个水滴形,表示花蕊,阴阳相和,釉色相交,小巧灵动。梅花一直为中国人所喜爱,尤其到了宋代,对于梅花的喜爱之情更胜,咏梅的诗文众多,陆游的诗中便有“檐飞数片雪,瓶插一枝梅”的场景描述。动物纹样之前一直以龙、凤、蝴蝶、鸳鸯为常见,但最新公布的资料<sup>4</sup>中,可见鱼、鹿、鸡等形象,实属难得。其中黑釉剪纸贴花双鱼纹瓷残器,其内壁偏下位置等距装饰三条黑色游鱼,生活可爱。鱼纹表现出典型的刻纸特点,鱼嘴、鱼眼、鱼鳞、鱼鳍、鱼尾均以镂空地色显示。茶盏是宋代“斗茶”之风盛行下的产物。斗茶的品评中,“茶色贵白”。黑釉茶盏成为显示茶白之色的最佳器物。此件双鱼纹瓷,若盛上品茶色,可想其曼妙的趣味。文字图案可见长命富贵、金玉满堂、福寿康宁等吉祥用语,表现出浓郁的民俗文化特点。四字吉祥语通常刻在柿蒂纹形内,四字各占一方,与外形相连,又字字相连。周密《志雅堂杂抄》中记载了“少年能袖中剪字”,可见“剪字”应是当时流行的文化事项。器物 and 人物图案比较少见。被认定为南宋吉州窑黑釉漏花杂宝纹的梅瓶上可见多个器物图案,<sup>5</sup>人物图案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吉州窑剪纸贴花茶盏。

<sup>6</sup>该件茶盏的人物图案非常罕见,其造型尤为精彩,侧身而坐的生动姿态表现在寥寥数根线条中,从上至下一气呵成,剪纸的特色不言而喻。通过对上述宋代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典型图案的举例,可见宋代剪纸的图案类型是丰富的,涉及各种常见的图案品类,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。

上述剪纸贴花瓷器反映的剪纸图案均是剪纸中最为主流的一种形式,即剔除多余部分,依靠笔笔相连的“阳形”表现图案造型,即留下的为图案。此外,还有一些剪纸贴花瓷器的图案则利用剪纸的“阴形”来表示图案造型。这一类图案的线条之间互不相连,类似于蓝印花布图案,需要纸作为背景才能显出,即剔除的为图案。比较明显的一件是命名为宋代吉州窑剪纸贴花米纹纹茶盏<sup>7</sup>的图案,显示出明显的漏版印花特色。另外一件推测为南宋至元代的吉州窑银锭形漏花碗残片<sup>8</sup>上,以相同的方式,显示“仁轩”二字以示款别。

通过查看宋代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的图案,以及联想当时吉州窑的生产盛况,不难看出作为辅助图样的剪纸多为刻制。剪纸艺术在宋代被广泛用在陶瓷、印染、建筑雕刻、刺绣等多个领域,从本质上讲,提高制作效率才是借用的初衷,而后才是艺术方面的考量。剪纸贴花瓷器上的梅花、吉祥文字等图案,大量出现,呈现出批量印花的重复特点。很明显,剪纸贴花的装饰手法,要比剔花、划花、画花等手段效率出众得多。宋代出现了专门的剪纸艺人,以出卖剪纸为生。从出产量上看,刻纸明显比剪纸高的多。这些艺人的大量出现,及其作品的批量产出,对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的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
宋代吉州窑以生产面向民间的日用瓷为重,剪纸贴花的装饰手段被广泛用于各类瓷器之上,实则反映出民间对于剪纸的喜爱之情甚浓,剪纸已经完成了与世俗生活的融合。茶盏是剪纸贴花的重要器型,数量较为可观。如果说,装饰在茶盏内壁的剪纸贴花,主要是为了显示茶叶的品质,增加斗茶的乐趣,那么其他装饰在器物外壁的剪纸贴花,则成为寻常生活中的审美对象,显示了剪纸的时代接受度和认可度。资料表明,剪纸贴花还被用于瓷枕、执壶、玉壶春瓶、梅瓶等其他瓷器上。很多罕见的剪纸贴花图案都出现在这些器物上,比如一件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瓷枕<sup>9</sup>上,出现了少见的鹤鸟纹和菊花纹。

当然,剪纸贴花瓷器在很多人看来不如青瓷高雅,不如釉下彩精致,历史也证明其在后来的岁月中慢慢衰落,用现在的话讲,这里涉及不同门类艺术或者工艺之间的“跨界”问题。很显然,剪纸贴花在瓷器中的运用,单从艺术创造上讲,显得有些乏味、单调,甚至生硬。但是从社会生活上讲,它无疑解决了生产效率的时代命题,更做到了“为人民的艺术”。作为一个历史现象,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成为宋代剪纸发展的旁证,显示出社会底层工匠和劳苦大众对于剪纸的熟悉和钟爱。

### 参考文献

[1]王伯敏,《中国民间剪纸史》,杭州: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2006年,第47页。

[2]仇凤皋,《民间剪纸与工艺图案》,《北方美术》,1997年第4期,第23页。

[3]王莉英,《吉州窑的装饰艺术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,1983年第4期,第18页。

[4]赵荣华、赵照,《南宋吉州窑瓷的最新发现》,《收藏家》,2010年第3期。

[5]熊振东,《浅谈宋元时期吉州窑的黑釉及彩绘和贴花产品》,《东方收藏》2019年第3期,第10页。

[6]张丽,《有关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工艺的思考》,《南方文物》,2013年第4期,第99页。

[7]许建林,《一件珍贵的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瓷枕》,见叶其峰,《文物鉴定与研究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2年,第164页。